

1979:当代新诗多元化时代的肇始

蒋登科*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内容摘要:由于思维惯性的影响,在“文革”结束后的较长时间内,报刊上公开发表的诗歌作品在思想、艺术上依然显得非常单一,口号化、概念化、公式化情形比较严重。一些具有探索性、创新性的作品,尤其是以“白洋淀诗群”为代表的青年诗人的艺术探索,只能以“地下”的方式悄悄流传,受众范围有限,影响不大。1979年,《诗刊》先后选发了北岛、舒婷、顾城等诗人的作品,有些作品虽然是夹杂在大量其他作品之中,但很多诗人和读者还是由此发现,在流行的写作方式之外,新诗完全可以拥有另一幅更具有魅力的面孔。其后又发表了大量青年诗人的作品,新诗的多样化实验逐渐浮出水面,当代新诗的多元化发展由此起航,关于新诗发展的讨论和争鸣此起彼伏,引发了中国当代新诗发展的一个多元化时代。因此,在中国当代新诗发展历程中,1979年这个年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关键词:1979;白洋淀诗群;《诗刊》;诗学论争;新诗多元化

无论在任何时候,具有艺术良知的诗人都是存在的,只是数量不同,存在方式也有差别。即使在“文革”这样的浩劫期间,真正的文学、诗歌也并没有消亡。除了少数具有一定艺术特色的诗人以其独特的艺术智慧活跃在公开出版的报纸、期刊之外,很多诗人都以特殊的方式在“地下”“民间”生存、聚集,悄悄凝聚着力量。这就是所谓的“地下文学”或者“潜在写作”。在诗歌领域,“文革”期间,一些诗人悄悄创作着关注社会现实、表达自己心灵的作品,艾青、曾卓、牛汉、流沙河、食指,等等,都有这样的作品,只是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些作品才能够有机会和读者见面。

这股潜流的第一次爆发是在1976年4月5日前后的天安门事件中。1976年1月8日,深受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人们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却遭到了“四人帮”的阻挠和

* 蒋登科,文学博士,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新诗中的国家形象建构研究”(15BZW147)的成果。

压制。这激起了人民更大的怒火,悼念活动非但没有停止,而且在全国各地更加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4月5日前后,在天安门广场形成了悼念的高潮。人们云集这里,将诗词贴在纪念碑上,挂在松柏枝叶间,并在人群中朗诵。还有人当场谱曲,带领群众歌唱。

天安门诗歌的作者绝大多数是不知名的普通群众。从内容看,天安门诗歌一是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和热爱,诗句发自内心、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丙辰清明,/泪雨悲风。/英雄碑前,/万众云涌。/百花滴血,/祭文高诵。/怀念总理,/天地情恸。”还有歌颂周总理一生高风亮节的:“总理一生为国酬,两袖清风无所有”,“马列才略屈指数,治国安邦第一臣”等。有表达周总理和人民之间的深情的:“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二是表达对“四人帮”的愤怒,如:“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悲愤之情溢于笔端。三是表达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如:“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我们不怕重上井冈山举义旗。/总理遗志我们继承,/‘四个现代化’实现日,/我们一定要设酒重祭。”这些诗歌大都言简意赅、短小精悍,而且众体兼备,手法多样,或比兴,或夸张,或象征,或铺陈,语言朴实,感情真挚,极富感染力,充分显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艺术创造力。^①

天安门诗歌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对当时的社会问题的关注,对那些颠倒黑白、是非不分的人、事的批判,对美好未来的期待,等等,在“文革”时期公开发表的作品中几乎是无法见到的。这是诗歌干预社会、关注社会的优良传统的一次集中展现,也是人民心中聚集的愤怒和渴望的集中展现,是思想解放运动的肇始,是中国诗歌重新获得发展的前奏。但是,由于当时还处于“文革”期间,人们的思想还被禁锢着,所以天安门诗歌运动并没有在很广泛的范围内流传开去,而且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如果说天安门诗歌存在诸多政治方面的因素,在体式上主要是以民歌和旧体诗为主,群体意识远远超越了个人创造的话,那么,另外一股更加具有艺术性、探索性、创造性的诗歌潮流,实际上也在“文革”期间逐渐形成了。一些远离政治、身处荒野的年轻诗人悄悄创作着他们认为具有价值、追求真实性的诗篇,这些诗人包括后来人们认定的“北大荒诗群”“白洋淀诗群”,等等,而这些诗人是新时期诗歌变革的预备队伍,以“暗流”“地下”的方式影响着中国当代诗歌的进程。

“白洋淀诗群”是“文革”中后期“地下诗歌”写作的最主要力量之一,也成为后来新时期诗歌艺术探索的最主要力量之一。就“白洋淀诗群”本身而言,“它开始于1969年,形成于‘文革’中后期,1972—1974年达到高潮,随着‘文革’结束与知青返城而在1976年而终止”^②。但是,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个时限和范围。白洋淀是“文革”期间全国无数的知青下放点之一,地处离北京较近的河北。因此,在白洋淀知青点中,知青的人员构成比较特殊,

① 参照百度百科“天安门诗歌运动”: <http://baike.baidu.com/view/939299.htm>。

② 李润霞:《“白洋淀诗群”的文化特征》,《南开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4期。

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是家庭背景优越、能够接触西方文学作品的高干子弟。他们在下放地自发地组织民间诗歌、文学活动,逐渐形成了在后来的诗歌史、文学史上具有不小影响的“白洋淀诗群”。“白洋淀诗群”的代表诗人主要有芒克(姜世伟)、多多(栗士征)、根子(岳重)、林莽(张建中)、方含、白青等。在当时,全国的许多地方如北京、河北、福建、贵州等地,都有类似的民间诗歌写作活动,有的还形成某种“群落”的性质。这些诗人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开始写诗,当时正是“红卫兵运动”的落潮期,这使他们对“革命”感到了失望,精神上经历了深刻震荡^①,于是试图以个体方式对真实感情世界和精神价值进行探求。毫无疑问,这些诗人的作品和当时的主流诗歌(在公开出版的报刊、诗集中发表的“文革”诗歌)相比,具有更多的个人元素、自由思考、探索意识和独立的艺术品性,是另一个层次的、具有诗学价值的探索,但也是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之下不允许出现和存在的探索。这种艰难的生长环境和过程使这些诗人及其作品在诗歌史、文学史、文化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具有了先天的难以超越的特征。

有学者对这个群落在新诗现代主义思潮发展中的地位 and 影响做了如下评价:

如果说中国当代新诗潮在“文革”初期经过先行者食指、黄翔的逃逸和突围,为新诗潮摆脱“政治专制”的诗歌包围奠定了最初的状态和流向,那么,到了“白洋淀诗群”实际上推进、扩展了新诗潮的河道,一路融纳着不断汇入的诗歌溪流,正向成熟迈进。如果说食指、黄翔是以浪漫主义为主导,融合了现代主义的某些特色,只是初步开始了现代主义诗歌的长旅;那么,“白洋淀诗群”已经使兼容浪漫主义的现代主义诗风成为主导倾向,从而为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当代的复归和重现做了重要的铺垫。如果说同时期的贵州诗人、上海诗人的群体性还不够显著,诗人的分布也较为零散,规模还较小的话,那么,无论在诗人的数量、诗歌的成就和对“新诗潮”形成的直接、显性影响上,还是在群体性特征与规模上,“白洋淀诗群”都堪称新诗潮潜流期最具代表性的诗歌群体,是中国当代新诗潮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②

当然,由于艺术风格、思想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和多样性,不少学者也认为,“白洋淀诗群”只是一个诗人群体,而不是典型意义上的诗歌流派。李润霞对整个诗人群落进行了认真调研和考察,指出:

“白洋淀诗群”具有群落的性质,但它是一个诗人群,而不是一个诗歌流派。尽管由

^① 这使我们想到了20世纪20年代一些作家的创作。随着“五四”运动的落潮,很多作家感到了苦闷、彷徨,于是他们开始创作关注个人内心的作品,出现了小诗热潮,出现了鲁迅创作的《野草》等,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特殊时期,也是成果比较多元、丰富的时期。

^② 李润霞:《“白洋淀诗群”的文化特征》,《南开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4期。

于“上山下乡”的被放逐命运使他们有了共同的人生经历,从而使他们的诗歌主题也具有了某种相似性,但他们的诗风却并非完全一致的,他们也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流派。在当时,他们并非一个自觉的诗学意义上的诗歌流派,也不具有诗歌组织的性质,也没有像后来的《今天》诗人群一样,既有自己的阵地,又有固定的文学活动,而且有一个核心人物(北岛),基本上是自觉的“同人”性质的创作集合;“白洋淀诗群”是一个“诗人”的集合,是一个“诗人”的群落,而不是诗歌流派的形成,但是他们在创作上却是一群“不自觉的现代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是不自觉地、不约而同地走上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路径。^①

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也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他们在当时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写出自己的真实的体验,也许对当时的艺术自觉可能产生的影响也许没有多少预测,但正是他们的这种艺术自觉引发了人们对于艺术、人生等多方面的思考,只要时代的土壤合适,这种自觉将会快速地延续、衍生开去,开启中国当代诗歌、文学、文化发展的新的方向和道路。

从历史的表层看,“白洋淀诗群”的创作、探索活动好像在1976年就戛然而止了。但是,思想、观念的流动和影响往往不会因为某个时段、事件的结束而终止,而且在遇到新的、合适的氛围之后,还会快速地繁衍开来。这一批具有探索意识、独立思考精神的诗人在回到城市之后,仍然坚持了他们对于历史、现实和人生的关注与思考,而且不断将这种影响扩大开去。在下乡期间,诗人们的探索主要是个体的思考,影响是小范围的,因为他们的作品无法公开发表,他们也没有自己的阵地。不过,这批知青主要来自北京,而且大多数都是主动要求去白洋淀的,在管理上也不像其他地方那样严格(比如有些地方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而是显得相对比较松散,他们可以有时间和机会回到北京,和其他一些身处城市的同学、朋友交流,或者找到更多适合自己阅读的书籍(有些甚至是“禁书”)。因此,有专家从更加开阔的视野分析了“白洋淀诗群”的构成:

“白洋淀诗群”又分为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仅仅包括在白洋淀插队落户的知青诗人;广义的“白洋淀诗群”还包括白洋淀的外围成员,他们是“准白洋淀成员”,包括同时期在其他地区(如山西的食指、黑龙江的马佳、内蒙古的史铁生等)插队的北京青年(如北岛),留在城里的北京青年,后来聚集在民刊《今天》周围的成员,如北岛、江河、杨炼、顾城、严力、田晓青、阿城、齐简(史宝嘉)等。另外,新时期后的一部分诗人、作家、画家、电影导演等艺术工作者在“文革”时期都曾与“白洋淀诗群”有着或深或浅的交流,如画家彭刚、书法家卢中南、作家史铁生、马佳、甘铁生、郑义,电影导演陈凯歌、田壮壮等。许多人虽然不写诗,但通过其他形式的艺术精神和艺术探索不同程度地参与、启迪了

① 李润霞:《“白洋淀诗群”的文化特征》,《南开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4期。

“白洋淀诗群”。在一个艺术贫乏的年代,白洋淀养育了一代“离家出走”的艺术浪子。^①

从后来产生的影响看,广义的“白洋淀诗群”更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这种松散的组合使他们的思想、观念、艺术追求等更容易传播开去。这种独特的构成也为后来新诗潮的公开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具体讲,就是催生了民间刊物《今天》的出现及其巨大的影响。

《今天》的主要人物如北岛、芒克、多多等,其实早就认识。下面的几段文字可以让我们了解《今天》和“白洋淀诗群”之间的特殊关系:

1972年,他(指北岛——引者)和多多第一次见面,却不是以诗人的身份,因为当时他们都还没有开始写诗。《今天》中的北岛、多多和根子(岳重)都很有音乐天赋。北岛记得,第一次与多多见面时,他们以歌手的身份互相介绍。多多是男高音,有点小名气,北岛那时刚学了几个月,不怎么着调,因此不得不接受多多的傲慢。他说,那天,“多多从他家的楼梯上走下来,戴一个口罩,根本就不摘口罩下来”。直到十年之后,他们再次见面,才对彼此乃至彼此的诗艺有了深入的认识——《今天》复刊之后的第一届《今天》文学奖颁给了多多。^②

第二年(指1973年——引者),他认识了芒克,他的一个名叫刘禹的同学说给他引见一下北京的先锋派一个团体。这个先锋派团体其实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芒克,一个是彭刚。1973年年初,芒克和彭刚花一毛钱分享了个冻柿子后,宣布成立“先锋派”……北岛对于这个年轻的现代派画家难以忘怀。事实上,他早在1975年就不再创作,在恢复高考后考上北京大学的化学系,走上了一条与艺术完全无关的道路,最后在美国硅谷的一家大公司里当上了总工程师。^③

“文革”结束之后,北岛和芒克开始筹备《今天》创刊。那是1978年一个秋天的晚上,北岛、芒克和画家黄锐(也就是星星画会的发起人)在黄锐家喝完酒之后,北岛提出是不是可以办一份文学刊物,芒克第一个拍手赞成,黄锐也很兴奋,这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说干就干,北岛的弟弟赵振先记得,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被眼前的一切弄得目瞪口呆。他看到他哥哥和几个人正在忙着将一册册的书装订,北岛告诉振先,他们正在办一本文学杂志,叫《今天》,这是第一期。振先看到,封面让一些粗黑的道道竖着分隔开来,一看就是铁窗,里面就刊登了北岛那首著名的《回答》。^④

伴随着第一期的面世,各种矛盾也出现了,主要原因是观点不同,会议经常不欢而散,除了北岛和芒克,其他编委集体退出《今天》,直到赵一凡、徐晓、周郅英、鄂复明等人

① 李润霞:《“白洋淀诗群”的文化特征》,《南开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4期。

② 河西:《北岛与〈今天〉30年》,《南方日报》2009年4月12日。

③ 河西:《北岛与〈今天〉30年》,《南方日报》2009年4月12日。

④ 河西:《北岛与〈今天〉30年》,《南方日报》2009年4月12日。

的加入,才使《今天》没有草草完结。

他们成了《今天》的中坚力量,他们更多的时候在幕后工作,用默默的耕耘来换取《今天》的荣誉。北岛说:“第一个阶段的《今天》一共出版了9期,从1978年12月到1980年的12月,实际上整整两年。以后我们就成立了‘今天文学研究会’。又出了3期的文学资料,我们组织了两次比较大型的朗诵会,在1979年的4月8日和1979年10月21日,这两次朗诵会,我想也可以说是自1949年以后唯一的。”

《今天》以诗歌最为著名。在并不多的几期刊物上,北岛、芒克、多多、江河、顾城、舒婷、严力等一大批后来被称之为“朦胧诗”的诗人从《今天》走了出来,并且因为《诗刊》等主流刊物的转载,而被大众所熟知。^①

从大量的回忆和访谈文字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和当时的一些民间的诗歌、文学、艺术爱好者,尤其是“白洋淀诗群”中的很多诗人,是有直接联系的,其中的一些人还参与了《今天》的策划、编辑,一直是《今天》的主要成员。而且,通过北岛的联系,舒婷等人也成为《今天》的成员。可以说,《今天》集中了当时具有才气、敢于在艺术上创新、突破的年轻诗人和作家,是中国当代文学意识觉醒和复苏的重要阵地。而且,这些诗人、作家大多有长达10年的创作经历,积累了很多作品,《今天》的创刊正好为这些作品找到了出路,有人认为:“《今天》创办后,十年潜伏期默默积存的大量诗歌终于得以走出地下,北岛、芒克、舒婷、严力、顾城、江河、杨炼等,都在《今天》上发表诗歌,这些压抑已久的声音,一经释放,产生了巨大的能量,感染并激励了无数年轻人。”^②这一评价应该说是客观的、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

《今天》是1949年以来第一个民间的文学刊物,是“地下文学”(或者叫“潜在写作”)浮出地表的具体体现。该刊第一期出版于1978年12月,经过两年多的坚持之后,1980年12月被关闭。在这段时间,《今天》共出版9期刊物和4种丛书。“每一期篇幅从六十页到八十页不等,内容有诗歌、小说以及评论。每一期的印量为1000本左右。”^③北岛回忆创刊的原因时说:“1978年秋,上层的权力斗争造成政治松动。以《今天》为代表的地下文学终于浮出地表,和美术、摄影等民间团体,形成冲击官方话语的巨大浪潮。《今天》是以诗歌为主的刊物,其重要诗人有芒克、顾城、多多、舒婷、严力、杨炼、江河等。由于印刷设备差,编辑部成了手工作坊,不少年轻人来帮忙。到1980年底被查封时,《今天》共出版了九期刊物和四种丛书,还举办了各种文学活动。每月一次的作品讨论会吸引着众多大学生。1979年的春天和秋天,《今天》在北京玉渊潭公园举办了两次露天朗诵会^④。导演陈凯歌那时还是电影学院学生,也来帮我们朗诵。在警察严密的监视下,近千名听众兴致盎然地欣赏那些费解的诗作。

① 河西:《北岛与〈今天〉30年》,《南方日报》2009年4月12日。

② 刘澍:《北岛与〈今天〉的三十年》, <http://www.eeo.com.cn/2009/0120/127756.shtml>。

③ 刘澍:《北岛与〈今天〉的三十年》, <http://www.eeo.com.cn/2009/0120/127756.shtml>。

④ 应该是指北岛在上文中提到的1979年的4月8日和1979年10月21日举行的两次朗诵会,影响很大。

自1949年以来,举办这样的朗诵会还是头一次。”^①可以看出,《今天》的诗人和作家对于诗歌、文学是发自内心地投入的,他们除了自己创作作品外,还亲自编辑、印刷刊物,同时,他们对于政治变化有着非同一般的敏锐性,对于上层人物在观念上的冲突和变化揣测得很准确,当然,这也使他们的作品在先天就打上了明显的时代、政治的印记。

当时,北岛他们对于文学、诗歌是非常虔诚的,刊物都是他们自己编辑,自己设计封面,自己印刷,自己到处张贴,甚至自己拿到街头去销售。“1978年12月20日,在北京亮马河畔的一间农民房——这儿是陆焕兴家——北岛、芒克、黄锐等七个年轻人都到齐了,拉上窗帘,围着一台又旧又破的油印机,共谋‘秘密行动’的激情振奋着每一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七个人动手干活,从早到晚连轴转,干了三天两夜。陆焕兴为大家做饭,每天三顿炸酱面。”“12月22日——这一天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晚上十点半,终于完工,屋子里堆满了散发着油墨味的纸页。七人骑车到东四十条的饭馆,要了瓶二锅头,为《今天》的秘密诞生干杯。接着众人商量把《今天》宣传单贴到哪些地方,又由谁去张贴。北岛和陆焕兴、芒克三人自告奋勇,此去‘凶多吉多’。”

第二天,北岛和陆焕兴、芒克三个人骑着车四处张贴《今天》,“三个工人两个单身,无牵无挂的,从我们家出发,我拿一个桶打好糨糊——这是在‘文革’的时候学会的。一人拿着扫帚涂糨糊,然后另一个人贴,因为冬天很冷,必须贴得快,要不然糨糊就会冻住,还得放盐防冻”。

他们把《今天》贴到北京当时重要的场所,西单、中南海、文化部,还有《诗刊》杂志社、《人民文学》杂志社、社科院、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胆挺大的。”北岛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门口碰到了徐晓,以前就认识她。我们正黑乎乎地往墙上贴的时候,她忽然间冲过来。徐晓就这样接上了,她也很吃惊。第二天贴到大学区,包括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②

这种虔诚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当时的很多人肯定是不愿意去做的,也可以说是这些诗人、作家、艺术家在一种特殊的氛围下对真实、崇高的寻思与发现。《今天》和“朦胧诗”后来得到了读者、文学史的重视和肯定,不是偶然的,而是这些诗人冒着巨大的风险坚持寻觅艺术真谛、探索人生价值的必然回报——在人们还沉睡的时候,他们已经觉醒,地位和荣誉自然应该属于这些较早醒来的人们。

1990年8月,北岛在奥斯陆复刊了《今天》。对于《今天》的艺术追求,北岛是这样概括

① 北岛:《〈今天〉二十年》, http://book.ifeng.com/special/30reading/list/200810/1022_4831_840751.shtml。

② 刘溜:《北岛与〈今天〉的三十年》, <http://www.eeo.com.cn/2009/0120/127756.shtml>。

的：“从办刊的方针来看，新老《今天》还是有其一贯的延续性的。坚持先锋，拒绝成为主流话语的工具。”^①经历过“文革”的诗人、作家对于“工具论”的危害是深有感触的。最初出版的《今天》，也正是因为摆脱了“工具论”的影响，而成为具有独特个性的民间刊物，并由此引发了中国当代诗歌的重要群落“朦胧诗”。

我们讨论那么多，主要是想说明《诗刊》在新诗艺术转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今天》出现的时候，中国新诗的总体的艺术观念并没有发生变化，官方的文艺政策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作为官方刊物的《诗刊》自然也必须遵循官方的文艺主张，对于民间的、独特的艺术探索，要么不能关注，要么加以批判，要么以特殊的方式加以关注，使其逐渐走向官方刊物，进而影响几近死亡的诗歌艺术。就历史事实来看，《诗刊》采用了第三种策略，就是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关注民间诗歌和刊物，从1979年开始选载《今天》上的一些作品，发表一些具有探索意识的年轻诗人的作品，使年轻诗人的具有独特新意的作品通过官方的刊物得到更多人的关注，或者说暗暗地将诗歌变革的种子播种于《诗刊》的缝隙之中，进而影响广大读者、诗人对诗歌的重新认识。这是《诗刊》在编辑方针上发生的重大转折，也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重大转折。对于这种影响，北岛本人是认同的：“《今天》虽被查封，但其诗作开始出现在官方刊物上，被统称为‘朦胧诗’，引发了一场持续好几年的全国性论战。在官方评论家眼里，它无异洪水猛兽。适得其反，批评引来更多的读者。被官方话语窒息的年轻人，终于找到呼吸的可能。有一阵在大学几乎人人写诗，办诗社，出诗集。直到商业化浪潮卷来，诗歌重新退到边缘。”^②

《今天》第一期发表了诗歌、小说、寓言、随笔、评论和翻译作品等，因为是油印，所以作品的量并不是很大，就诗歌篇目来说，主要由乔加的《风景画（外二首）》、舒婷的《致橡树（外一首）》、芒克的《天空（外二首）》、北岛的《回答（外二首）》。因为刊物散发比较广泛，甚至送到了《诗刊》的一些编辑的手中，因此，这期刊物影响比较大。对照《今天》创刊号上的作品，查阅1979年的《诗刊》，我们可以发现，《诗刊》转载的作品主要包括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前者刊发于当年第三期，后者刊发于当年第四期。而这两首诗都成为诗人的代表作。

这两首诗都是通过邵燕祥的编辑而发表的。在版面安排上，两首诗都没有安排在最显眼的位置，北岛的《回答》安排在1979年第3期的第46页，而且在该页的下方，其前面刊发的是关于“四五运动”的《清明，献上我的祭诗》和《方砖赋》。《回答》的诗末标记的时间仍然和《今天》上标记的一样：“1976.4”，这就很容易使人将其和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联系起来，并且把作品针对的对象限定在“四人帮”身上，从而避免一些别样的猜测。事实上，这首诗写于1973年，修改定稿于1978年，其思想和现实根源是很广泛的，在《今天》发表时加上“1976.4”，主要是为了安全，而《诗刊》的转载恰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安全”。1979年4月

① 河西：《北岛与〈今天〉30年》，《南方日报》2009年4月12日。

② 北岛：《〈今天〉二十年》，http://book.ifeng.com/special/30reading/list/200810/1022_4831_840751.shtml

号发表舒婷的《致橡树》时,同样没有出现在显眼的位置,甚至没有在目录上出现诗的标题,而代之以《爱情诗九首》,《致橡树》发表在56页的下半部和57页的上半部。邵燕祥回忆说:“这两首诗并没有排在杂志的显著位置,在每一小辑中也没有让它们打头,毋宁说是故意的安排,以减少可能遇到的阻力。然而我们的读者很敏感,他们还是在不起眼的第几十几页上发现了这两首诗,发现了陌生的诗人的名字。编辑部听到很多赞许的声音。”^①可以看出,《诗刊》和一些有良知的编辑为推动诗歌观念的新变,付出了大量心血。当然,效果也是很明显的。

当时,《诗刊》的主编是严辰,副主编是邹荻帆和柯岩,面对当时不断出现新变的诗歌艺术探索,《诗刊》并没有畏首畏尾,而是予以热情关注,邵燕祥以诗人和编辑的良知极力推荐新人新作,他说,当时极力推荐这些诗人和作品,除了三位主编的信任之外,“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尽量多发好诗是一个诗刊的职责,发现有才情的诗人特别是年轻诗人,可以说是诗刊编辑的‘天职’。因此我在决定转载北岛、舒婷二诗时,没有什么顾虑”^②。这虽然只是两首普通的诗,但就诗歌发展来说,却是一件大事。

第一,承认了地下写作在艺术上具有特色和价值。作为中国当代最权威的诗歌刊物,《诗刊》所关注的诗人、作品,往往可以产生很广泛的社会影响,《诗刊》发表的作品也可以暗示或者引导一种新的诗歌艺术观念。换句话说,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中,受到《诗刊》的关注可以成为诗歌作品、诗人得到读者和诗歌界承认的重要标志之一。有学者认为:“《今天》作为民间刊物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很难估量,它艺术上散发的新鲜气息是否深入到当时文学界也是一个未知数,唯一可以验证的是转载在《诗刊》上的作品其影响力是空前的。这一切得益于从‘文革’结束开始一系列的重要刊物陆续复刊,出现了文艺上的‘回暖’。”^③1949年以来的第一个民间文学刊物所刊发的作品,受到《诗刊》的关注,一方面说明《诗刊》对于过去的主流诗歌观念有了新的思考,另一方面说明《诗刊》对于来自民间的诗歌艺术探索存在一定的认同,或者说,《诗刊》试图通过一定的方式使过去比较单一的刊物变得越来越丰富,这样做的结果是,既追随了当时的创新思潮,又对一些年轻的诗人进行了扶持,可谓一举多得。

第二,虽然开初只是在某些栏目之中夹入了少量来自民间刊物和青年诗人的作品,但它们为诗歌带来的新气象,使诗歌的多元发展态势逐渐形成,为新诗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对《今天》的关注,《诗刊》逐渐开始发表一些和过去的观念很不一样,甚至可以说大相径庭的作品,这些作品除了来自“归来者”诗人,还包括“朦胧诗”诗人和其他年轻诗人。有人对

① 邵燕祥:《答〈南方都市报〉记者田志凌问》,见邵燕祥散文随笔集《南磨房行走》,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16页。

② 邵燕祥:《答〈南方都市报〉记者田志凌问》,见邵燕祥散文随笔集《南磨房行走》,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16页。

③ 梁艳:《〈今天〉(1978—1980)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

此进行过简单描述:“《诗刊》从1979年开始就陆续发表了几类风格迥异的诗歌,最引人注目的一类就是所谓‘归来者’的诗歌,另一类则是一些新人的诗歌。所谓‘归来者’诗歌是指一批复出的老诗人纷纷发表作品,比如1979年1月号《人民文学》刊出艾青的长诗《光的赞歌》,新人的作品则是指《诗刊》3月发表了北岛的诗《回答》等,4月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8月刊登了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通过《诗刊》对新人新作的推介,《今天》开始由地下状态进入公开状态,1980年1月食指早期具有极强影响力的诗作《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在《诗刊》上正式发表;1980年的4月,《诗刊》就推出了‘新人新作小辑’,集中刊登了15位新人的作品,八月号的‘春笋集’又有15位新诗人登台亮相。”^①通过这些措施,以《诗刊》为中心阵地、《诗刊》作者为主要队伍的诗歌观念逐渐出现了多元化格局,中国诗歌呈现出和“文革”诗歌完全不同的面貌。当然,也正是这些新的观念和艺术手段,使一些习惯了过去观念的人们出现了危机感,对青年诗人的探索提出了质疑甚至批评,于是出现了长时间的诗学论争。

第三,这些来自民间刊物的少量作品被《诗刊》转载之后,引起了一些诗歌人士的关注,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除了《今天》上北岛、舒婷的作品之外,《诗刊》1979年7月号刊登了舒婷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这也是一切》,11月号刊登顾城的《歌乐山诗组》。这些都是后来“朦胧诗”的代表性诗人和作品。其他一些青年诗人^②的名字也大量出现在当年的《诗刊》上,如雷抒雁、曲有源、叶文福、孙友田、张学梦、向求纬、徐晓鹤、傅天琳,等等。这说明“朦胧诗”诗人和其他青年诗人及其作品逐渐开始得到正统群体或者说主流诗坛的承认。这种做法也引起了诗歌界很多人(尤其是观念比较开放的老一辈诗人)的认同,郑敏、袁可嘉等著名诗人、学者都撰文予以肯定。但是,对于这些新的诗歌试验,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对于批评、反对的声音,《诗刊》也没有打击压制,而是以一定的篇幅予以刊载,这样,《诗刊》就成了新时期诗歌论争的重要阵地,不同的声音都在这里汇聚。许多观念在辩论之中得到了强化,也有一些不符合诗歌艺术特征和规律的观念被人们反思和批判。这些讨论使人们对于诗的特征、诗的艺术规律、诗的艺术发展、中国诗与外国诗的关系等问题有了越来越明确的认识,消除了过去对于诗歌的狭隘甚至偏颇的认识,这对于诗歌观念的更新、诗歌艺术的发展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新时期诗学界的“三个崛起”以及争鸣而形成的“传统派”“崛起派”“上园派”等诗学群落,都和《诗刊》提供的阵地、组织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可以说,因为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实施,因为“朦胧诗”艺术探索的出现,其他青

① 梁艳:《〈今天〉(1978—1980)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

② 这些青年诗人被吕进称为“新来者”。他在《新时期诗歌的“新来者”》(《文艺研究》2010年第3期)一文中,将新时期诗歌的诗人队伍分为“归来者”、“朦胧诗”诗人、“新来者”。“这里所谓的新来者,是指两类诗人。一类是新时期不属于朦胧诗群的年轻诗人,他们走的诗歌之路和朦胧诗人显然有别。另一类是起步也许较早,但是在新时期成名的诗人,有如新来者杨牧的《我是青年》所揭示,他们是‘迟到’的新来者。新来者诗群留下了为数不少的优秀篇章。”“他们的不同歌唱构成了新时期诗歌的繁荣。”

年诗人的加入,再加上以艾青为代表的诗人的“归来”,从1979年开始,中国新诗发展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创刊20多年的《诗刊》也再一次开始了具有个性、艺术性的探索阶段。

有学者对1979年的《诗刊》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中的特殊地位进行过研究,指出:

1979年的《诗刊》正处在承上启下的中间物的位置上,既可看出与传统的断裂,也能发现朝着现代变革的新质。对于十年历史是平反和控诉,对于“现代化”是急迫和期盼,正是这种社会情感和文学情感的统一性,使《诗刊》建构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借助于此个体找到了群体的认同和情感的暗合。

由于时代的剧烈变动,1979年的《诗刊》类似于地质的断裂带,与历史有丝丝入扣的关联,但一条裂痕却明显地出现。洋流产生剧烈变动的地方往往是冷暖流交汇之处,能为鱼儿带来大量的饵料。而时代剧烈变化产生断裂的同时,也孕育着新生,一些原本在旧时体制下不可能出现的新人有了出现的机会。^①

这样的评价基本上是符合当代历史和诗歌发展的事实的。亲身经历过1979年诗歌风潮的《诗刊》编辑王燕生也这样回顾:

1979年,诗歌在中国就像迎来了自己的节日。它就像那个时代的舒筋活血丹,人们压抑在心里几十年的话一下子像潮水一样涌出来,而诗歌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当时,除了《今天》等民间刊物,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诗社。高校、首体经常举办大型诗歌朗诵会,而且每次都座无虚席。^②

从1980年开始,随着袁可嘉、郑敏等具有现代主义观念的诗人、评论家对青年诗人探索的肯定,和年轻的谢冕、孙绍振等对于诗歌艺术“崛起”的思考,以及另外一些坚持传统主义观念的诗人、评论家对这些具有新意的探索的批判和否定,诗歌界、诗学界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论争。这些论争使人们对于诗歌的理解越来越全面、完善,诗歌艺术探索的路向越来越广阔,外国诗歌艺术经验逐渐被借鉴和转换为中国新诗的营养。虽然经历过一些波折,但中国诗歌最终朝着多元、丰富的格局发展着,民间诗歌报刊出现了泉涌的局面。这些在新诗历史上都是少有的。因此,作为对诗歌历史的关注,我们应该记住《诗刊》的敏锐和大度,记住1979年开始的诗歌艺术转型和1980年开始的学术争鸣。

① 庄莹:《1979年的〈诗刊〉——社会转型的裂变与重构》,山东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② 王燕生:《一段不该淡忘的诗歌史》,《新京报》2004年11月18日。